

无形的纽带

价值链下的制造业变革以及全球化争论的扭曲

杜大伟

走进纽约或慕尼黑的丰田经销店，你可能会认为你看到的是日本制造的汽车。不过，你错了。事实上，构成一辆现代汽车的15000个零部件通常由不同地点的不同公司所生产。三个主要的汽车生产中心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研究开发与设计主要在德国、日本和美国进行，此外中国也开始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其每年培训500万名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毕业生。每一个中心都将高收入经济体的产品与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零部件结合起来。零部件在生产过程中跨越了多个边境。

从智能手机和汽车到电视和电脑，如今超过2/3的国际贸易都发生在这样的全球价值链中。这一比例高于2001年的60%。价值链的崛起重塑了世界经济，推动中国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兴市场显著提高其经济生活水平，同时造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然而，在前价值链时代就已发展起来的数十年里收集贸易数据的方法未能反映出这种变革，导致对于世界各地商品和服务流通的看法出现偏差。其结果是：激烈的辩论将失业问题归咎于贸易其实是源于数据不足，放大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误导性呼声。

以中国出口智能手机为例。当智能手机运往美国时，官方贸易统计数据将手机的全部价值作为从中国进口的记录。但是，关于价值链的研究，如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s）显示，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美国从不同合作伙伴进口不同类型的增值产品，包括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装配和来自韩国的精密制造物料。这是因为官方贸易统计数据衡量的是贸易总值，而不是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增加值。此外，官方统计数据并未反映出制成品价值所包含的服务（如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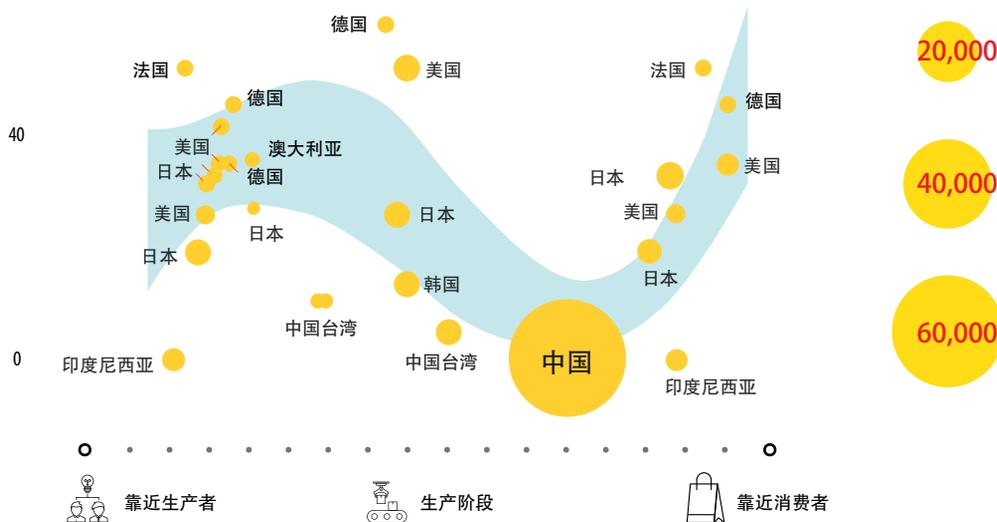
增加价值

中国对电气和光学设备出口的贡献处于价值链的末端，主要集中在一些简单零部件的生产和装配。

(每小时的补偿, 美元)

80

(增值收益, 以100万美元计)



资料来源: 世界贸易组织, 《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注: 基于2009年的数据。

计算机编码、物流和营销) 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一款名义上是由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的增加值(如计算机编码和营销)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从增加值角度来看, 双边贸易失衡状态有明显差异。举个例子, 当从贸易总值转为增加值进行分析时, 具有争议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致会减少一半, 这是因为中国往往处于许多价值链的末端。

增长引擎

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是一个福音, 因为能使它们更容易实现多样化, 从初级商品向更高增加值的制成品和服务业转型。如何实现呢? 通过将生产过程解构为众多环节, 就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执行不同的步骤。在过去, 一个国家必须掌握制成品的整个生产链才能出口, 这种情况现在鲜少发生。通过价值链, 一个国家可以专注于一个或多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工序。

这种现象使中国能够出口所谓的高科技产

品, 尽管其角色主要是产品装配商。为了应对竞争和物流成本下降, 生产的拆分过程始于发达经济体, 然后随着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对外开放而走向全球。

2009年中国出口电气和光学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相机)的全球价值链显示了该国所扮演的角色(见图)。图中的纵轴表示每小时工人的补偿, 这是衡量增加值的标准。横轴显示了生产过程的步骤, 起点是发达经济体的高附加值设计和财务投入。然后是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计算机芯片等精密零部件。中国通过生产一些简单的零部件和装配, 在生产链的末端增加价值。中国还与金属和塑料制造等当地产业有许多所谓的后向关联, 这有助于装配前的中间品生产环节。最后, 由于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和日本, 因此生产链最后一环节的高附加值投入主要是服务。在向美国出口这些产品的情况下, 中国几乎贡献了一半的增加值。该国相当大的增值份额为大量低技能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帮助推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因此, 这种打破

传统生产过程的方式使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落脚中国，增强了中国的比较优势。

越南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另一个典型案例。继 20 世纪 80 年代末市场化改革和贸易对全球开放之后，越南吸引了韩国三星等外国公司的大量投资，这些外国公司寻求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装配场地。越南政策制定者担心该国会陷入低端生产链而停滞不前，但针对生产链的分析表明存在广泛的后向关联，即许多公司向出口商出售产品，但其并不是出口商。2012 年，为出口制造型企业工作的越南人约有 500 万，为向出口商出售产品的公司工作的越南人数量更多，达到 700 万人。这种联系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壁垒比发达经济体的更高，但他们认识到，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力，出口商需要获得最佳的进口投入品。解决问题的一个通行做法是通过建立经济特区，让出口商可以免税获得进口零部件。中国深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实现整个经济自由化，以便在国内销售的间接出口商和商品生产者也可以获得最佳投入，这样更为有益。

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也有利于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往往专注于高附加值的活动，如先进技术、金融服务、精密制造业零部件、市场营销和服务业。不过，还是会有赢家和输家。研究发现，由于与中国及为其价值链做出贡献的经济体进行贸易，美国失去了中等技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同时在高技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获得就业机会，使总就业率基本保持不变。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工人的工资上涨，而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工资则下降。

影响不仅限于美国。1995—2015 年，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向贸易和价值链扩张时，发达经济体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增加，中等技能

就业下降。这不是贸易的全部结果，许多研究都强调技术变革的主导作用。涉及日常重复工作的中等技能工作最容易被自动化取代或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从而使雇主能够削减成本。发达经济体剩余的更多是技术和技能密集型活动。此外，许多建筑、健康医疗和酒店业的低技能工作难以实现自动化或外包。

贸易和价值链扩张的直观分配结果正在推动富裕国家强烈抵制全球化，并呼吁实行贸易壁垒。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兴起之前，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糟糕的策略，而现在这项策略更加糟糕。例如，2018 年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包含对价值 5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以及对价值 2000 亿美元商品额外加税 10%。零部件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37%，而征税商品的清单似乎赋予这些项目更多权重，在这些项目上美国公司在过去更具竞争力。关税成本转嫁给美国公司，因此造成美国公司的销售额下降。甚至在中国贸易报复对美国出口商造成额外损失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在复杂的价值链世界中，很难预测进口关税的确切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一些公司和工人将受到伤害，其总体影响是负面的。

公共政策不应试图阻碍发展，而应设法减轻对失业工人因调整而受到的影响。在帮助受变化影响的工人和社区设计安全保障体系时，区分贸易和技术造成的失业是没有意义的。一些发达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更好地适应了全球化。例如，在德国，由于累进税制和强大的安全保障体系，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变化（以考虑税费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另一方面，在美国，不平等现象大幅增加，因为公共政策通过削减累退税加剧了就业和工薪两极分化的市场趋势。

转变观点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约有 80% 的世界贸易由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如食品、石油、矿产等）组成，

剩余 20% 由旅游、海外留学和国际金融等相关的服务组成。这一比例在 40 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当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进行分析时，情况则明显不同。服务贸易增加值的份额从 1980 年的 31% 上升到 2009 年的 43%。这意味着商品的服务内容正在增加。一部分增长反映了软件的使用日益增加。此外，全球供应链管理更多地依赖于运输、金融和保险等服务。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服务价格上涨，而制造业价格下降（主要因为该产业生产率增长相对更快）。

对于所有主要经济体而言，服务贸易对于增加值的贡献大于对总值的贡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34 个经济体中，服务业占出口增加值的一半左右。那些较好融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墨西哥、中国、越南和泰国等）的这一比例约为 40%。此外，发达经济体进口大量服务作为其生产链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不同，因为其往往对服务进口和对投向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更大的限制。最近的研究表明，使用进口服务可以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制成品出口，因为增加全球最好的投入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发展中经济体的启示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贸易理论，但确实形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解构生产过程为发达和落后经济体融合提供了新的机

会，也为每个经济体都带来了潜在的利益，虽然同时也伴随着疑问。我已经提到了一些深入参与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但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被排除在外。全球化就像一个快速行驶的列车，你需要一个平台让它在你的位置停下来。构建这个平台需要市场所依赖的所有基本要素：法治、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即使是取得些许成功的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已经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减贫。

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存在类似的挑战：融合和创新刺激了就业和工薪变化，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利用贸易保护试图减缓或逆转这些变化颇具吸引力。但完全的贸易孤立将使你摆脱动态的全球经济，部分保护将使一些公司受益而牺牲其他公司利益，同时也会伤害消费者。由于现代价值链的复杂性，不可能微调贸易政策来帮助一个地理区域或一类工人。随着生产和就业的自然发展，更应该着眼于缓和调整。

对富国和穷国来说，自由贸易都是最佳政策。全球已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合理的自由贸易（至少在最近的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之前）。但服务业领域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更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鉴于服务业在生产和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应该使其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下一个重点。FD

杜大伟（DAVID DOLLAR）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